

唱本 上

薛儒成 编著



三秦出版社

陕南传统音乐文化集成卷七

唱 本(上)

薛儒成 编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 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唱本:全2册/薛儒成编著. -- 西安:三秦出版社,
2017.4

(陕南民间传统音乐文化集成)

ISBN 978-7-5518-1472-0

I. ①唱… II. ①薛… III. ①说唱-民间艺术-
介绍-镇安县 IV. ①J8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6815号

唱本:全2册

薛儒成 编著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 话 (029)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陕西隆昌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38.25

字 数 980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000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1472-0

定 价 168.00元

网 址 <http://www.sqcbs.cn>

编辑委员会

顾 问：李 波 贾建刚

主 任：李 娉

副 主 任：任淑霞 詹道有

成 员：陈晓乐 金 辉 苏 明 刘立勤 瑚 珩

吴相阳 薛儒成 肖建军 王鹤正 邓 飙

唐仁晋 李 广 姚元坤 储德政 李小红

编写说明

1. 本书采录、整理、汇编了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民间歌、戏、曲、乐藏品一千余件（篇、首）。其中已列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有花鼓戏、渔鼓说唱两种，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有民歌、鼓盆歌、三弦弹唱、唢呐曲牌四种。

2. 全书共分九卷：第一卷为民歌（上），收录山歌、草歌、山歌式调子、草歌式调子、复合式调子、姐儿歌、阳锣鼓草歌等七种山歌类民歌；第二卷为民歌（下），收录一般小调（包括儿歌）、丝弦小调、社火小调、风俗小调等四种小调类民歌；第三卷为鼓盆歌（上），收录哭腔歌、戏腔歌、杂腔歌、鼓盆歌锣鼓经四种；第四卷为鼓盆歌（下），收录硬腔歌一种，分叹情编、咏史编两类；第五卷为花鼓戏（上），收录开场篇、岔子戏两种，岔子戏含七岔戏、八岔戏两类；第六卷为花鼓戏（下），收大筒子戏、小调戏两种；第七卷为唱本（上）风情编；第八卷为唱本（下）孝善编；第九卷为三弦弹唱、渔鼓说唱和唢呐曲牌。

3. 本书一至四卷属歌；五、六两卷属戏；七、八两卷所收唱本，与九卷所收三弦弹唱、渔鼓说唱两种均属曲；九卷唢呐曲牌则属乐。歌、戏、曲、乐四类作品之前均有概说，介绍相关情况。

4. 本书系简谱版。有的歌词几十首（段），甚至更多，但每首（段）唱腔相同，为节省篇幅，本书则仅将第一首（段）歌词对应排出简谱，后面同曲异词者只列歌词。

5. 本书所录民歌、鼓盆歌、花鼓戏、唱本、三弦弹唱、渔鼓说唱均为方言演唱。有的方言词语在《现代汉语词典》找不到对应的字，只好取相近之音的字替代。如“歌师唱歌你莫扯”歌中“扯”字意为抖威风、耍牌子、趾高气扬等；再如“雀薄”，意即刻薄、吝嗷。还有的义近但音根本不同，如“声声句句做狗嗽”中“嗽”普通话读 óu，拟声，而此句中意为哭嚎，音则读 ngào，普通话中无此音节。

6. 为保留方言方音特色，本书采录歌词用字很多该用助词“得”的句子，都用助词“的”。如“同行唱歌唱的好”“字字句句表的清”“孟母生病怪的很”等句，“的”音均读 dì，同“一语中的”“有的放矢”之“的”音，而不读 de。

7. 本书标点符号处理，照顾韵文排列整齐特点，本该用引号之处均不用引号，该用冒号之处则多用逗号。如本书下段韵文：“[王母]手拿菜刀进柴门，/王览大喊贼进门，/哥哥快来捉贼人！/朱氏叫儿你莫惊。”按标点规范处理当为：“[王母]手拿菜刀进柴门，/王览大喊：‘贼进门！/哥哥快来捉贼人！’/朱氏叫儿：‘你莫惊！’”但本书一律从简处理。又，韵文中表并列人名的，按规范人名中间应加顿号，本书鉴于一望即知、不影响文意理解，便不标顿号。如：“孙虎胡奎一齐上，/王坤李宗低头想。”

8. 本书各卷概说并序言、特载一律通排。凡带曲谱的篇章，也一律通排。但是，为节省版面，凡不带曲谱的韵文，则分两栏排版。

序 一

一个人和一个县的民间音乐文化遗产

乔建中

陕南镇安人薛儒成，一向自称“草根”。然而，自从2016年春与他相识，一年以后，他托西安音乐学院王平教授把九大卷《陕南传统民间音乐文化集成》校阅稿交到我手里起，我却愿意称他为儒成君。君者，王也，贵也，有修养、有德行之人也。儒成君“贵”在哪里？“德行”在何处？让我慢慢道来。

谁都知道，编这样大部头的民间音乐集成，需要先到乡村山寨寻找唱家一字一句、一首一段地采集记录。儒成君从2005年春天某日因为一个偶然机遇，开始从民间歌手口中记录镇安民歌起，直到2017年印出校稿，十三年间，全部凭自己的一份工资支付交通住宿和唱家们的酬劳。须知，这样的作为，不是一次两次、一年两年，而是漫长的十三年。我从事全国民歌集成审稿工作近三十年，听到各地“集成工作者”可赞可颂事迹多矣，但像儒成君一连十数年自愿用工资采录而从未想到要回报的人，他是第一位。如果没有高远之志、致厚之德，能够支撑这样的坚持和坚守吗？

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儒成君不仅自己全身心投入，还把全家人都“拖”了进来。夫人用辛劳所得养家，女儿办“复印”店帮他输入唱词、乐谱，加上女婿、儿子、儿媳，有如一个自发组成的家庭“集成编辑部”而共助其成。如此和谐、如此一心、如此有文化自觉的家庭，在当下中国，我们也很难找到。窃以为，这同样是一种高贵之德行。

再者，儒成君在“集成”的《自序》中说：“十三年来，多少次寻人不遇，多少次遇人不唱，多少次被司机借故扔在半山，种种艰难曲折，般般心酸委屈，不足与外人道也。”看到这里，我读不下去了，掩卷闭目，细细咀嚼他写下的每一个字，“不遇”“不唱”“扔在半山头”等等，对于一位将个人生计、健康置之度外、专心一意挖掘故土民间音乐遗产的人来说，如此境遇，“艰难”可以不“道”，但当时内心的焦虑心痛，却是永远忘不了的。任何一位有过民间文化考察经历的人，也一定能够体会这样的“痛”。然而，即使有这样“多少次”的“不遇”“不唱”，也没有让他停止放弃。如此这般，他十三年如一日地坚守下来了。这样不屈不挠的男儿浩气，不也是他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德行？

说完儒成君为挖掘家乡音乐文化遗产而敞开的高贵心志和清纯人品，我想再说说他编著的这套“集成”的价值和给我的启示。

你可能要问，中国“十大文艺之书”早在十多年前就完成了，再在一个县重新采集、记录、编辑、出版，必要性到底在哪里？

问得好！其实我自己也一直在关注思考十余年来各地不断出版的许多篇幅很大、某类民间音乐品种的“大全”“大成”“全集”这一现象。是的，从国家层面而言，每省区十大卷本的民歌、戏曲、曲艺、舞蹈、器乐等“集成”，乃史无前例的文艺典籍巨制，自2009年出齐后，影响甚大，也相信它会传之久远。但中华文化极为丰富的民间蕴藏，不可能因为一次相对全面的收集记录工程而“一网打尽”。对于“矢口寄兴”、转瞬即逝的口传艺术而言，所采录到的篇目数量永远都是相对的。况且，各类“集成”的省、区、市卷，从来都要受到篇幅的限制。例如，民歌集成的省、区、市卷本，一般都

要求在800至1500首之间。但对于某些蕴藏丰富的地区，不要说一个省，就是一个市县，选出800至1500首民歌，应该没有困难。以镇安县为例，入选《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者，不过聊聊几首，再翻阅1980年代编的“镇安县民歌”，则已有120首之多，这样大的筛选比例，绝不仅仅是由于曲目的品质不高，而主要是因为篇幅所限。儒成君这一次所编的上、下卷“镇安民歌”，总共达400余首，是《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所收镇安民歌的近100倍，是当年“县卷”的近四倍。这显然不是这三十年间我们的歌手们突然新创作了几百首民歌，而应当是当年采录时囿于时间、人力、财力等的限制而没有做到真正的普查。所以，才在我国已经步入“后集成”时代或曰“非遗”保护时代，不少地方音乐工作者又自觉地担当起“集成”的“补遗”或“新编”之为。也恰好在这个时候，陕南镇安出了一个薛儒成！正像他所云，他自幼年到青年，曾经两次与音乐结缘，但这两次的“缘分”似乎都还没到，所以才有了2005年的第三次。这第三次是他自己的主动选择，可以不受相关条件的制约，主要是看他能否把“尽量跑遍所有乡镇，不留死角”这个理想、能否把这个君子之“一诺”真正进行到底。2017年春，当他把两卷民歌、两卷“鼓盆歌”、两卷“唱本”、两卷“花鼓戏”和一卷包括“唢呐曲牌”“三弦弹唱”“渔鼓说唱”等共九卷七个品种、总计千余首、二百万言的镇安民间音乐“集成”摆在世人面前时，人们才大吃一惊：镇安作为秦楚文化的一个交互“覆盖区”、一个汉水流域不大起眼的小县城，竟然分布流传着如此多样、如此密集、如此丰富的民众之绝唱。

诚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我们曾经有过许多次的民间音乐采录活动，有大规模的，也有小规模甚或一两个人的，有普查性质的，也有专题性质的，采录之后，都会编为“选集”或音乐学文论。就中国民间音乐文化的现代整理和研究事业而言，其功德、功用皆不可没，并将永远受人敬仰。儒成君紧步其后，默默而为，同样让人叹服。所不同者，他只靠自己的一腔热情，不求人，不声张、不靠任何外力，一个人寻访，一个人记录，长年坚守，终成正果。就其采录时间之长、所涉品种之全、所录曲目之多，所挖掘层面之深而言，我敢说，天下无第二人可以与之相比。如果全国各地县一级的地方音乐家都能够像他这么做，中国民间音乐蕴藏的挖掘整理，必将呈现另一种壮阔辉煌的景观。故，儒成君之为，堪称典范矣。

对于儒成君而言，“集成”的编辑出版，自然是让他持续了一生的“音乐情缘”有了一个圆满的了结，同时也让他用“集成”践行了父亲在幼时随口而说的“人怕做活，活怕人做”的训导，别看这句话出自一位普通农民之口，它所内涵的永恒力量和哲理性，可以让人受用一生：当你遭遇艰难想放弃自己的目标之际，它会鼓舞你坚持下去；当你处于浮躁、意乱时，它会提醒你一定要认真踏实，专心细心，做好每一件事。

儒成君的“集成”对于镇安县而言，不仅是一份包含巨大历史文化价值的珍宝，也是全面反映本县民众千百年来的智慧创造和本地民俗生活的百科全书，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的进一步深化，这些在千百年间沉淀下来的口碑文化将成为人们认识历史、贴近传统的最可宝贵的珍贵文献。

这套“集成”对于音乐学界、民俗学界、语言学以至社会人类学界，既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同时它也告诫人们：民间文化蕴藏之深不可低估，民间音乐文化资源之多不可轻视，对民间文艺、特别是口碑文艺的采集、记录也不可能一次采全采完，无论出于何种取向，我们都应该像儒成君这样，持续不断，随时进行，特别是处在当下现代化的高速度进程中，我们更应该关注农耕时代留下的文化瑰宝所遭遇到的冲击、挤压乃至式微趋向，用心用力保护、传承我们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就在他近日来西安与我交流时，知道我这几年很关注明清以来从东部地区传播到西北的“俗曲”“曲子”后，他

很兴奋地告诉我，镇安也有关中和西北各省区流行的这类“曲子”，原因是镇安是秦楚文化的交汇之地，由于部分楚方言被“秦化”，部分秦方言被“楚化”，一些与秦、楚两地有渊源关系的民间音乐品种也就被部分地保留下来了，镇安“曲子”是其中之一，而在此之前，镇安“曲子”似乎少有人关注或采录。因此，我们应当从这套“集成”中检视以往学术研究、收集记录的缺失，像儒成君那样，在充分相信民间智慧和民间创造的理念指引下，深入到山乡村镇，再挖掘、再采录。

儒成君在2005年春季，完全是以平常人做平常事的心态庄重启程，但他最终却完成了一件不平常的伟业。面对这位镇安百名老歌手的知音，本土文化的挖宝人，以及将要面世的镇安九大卷“集成”，我们要感谢历史、感谢传统、感谢一代又一代创造民间音乐的歌者，感谢儒成君，并恭恭敬敬地向他们起立致敬！

（作者：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博导）

2017年4月22日晚于古都西安

序 二

闻歌始觉有人来

——薛儒成编著《陕南传统音乐文化集成》序

王 平

中国古代“采风”活动，最迟当从《诗经》时代算起。《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说的就是诗经时代。距今该有2500年了。诗经时代的诗歌与吟唱是一体的，还没有分开来。这样算来，有关民间音乐的“采风”活动，我们已走过了长长的路途。在如此浩瀚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形象鲜明、感情真挚的歌谣等民间音乐作品，在众口相传之际得以保存；中华民族的音乐精神也得到了有效的传递延续，并在此基础上有机会发扬乃至重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我看到薛儒成先生倾数十年心力，历经漫长而艰辛的田野调查，加上繁难的词谱记录等研究工作，最终完成这套《陕南传统音乐文化集成》时，内心充满敬重和感佩之情。这套集成即将付梓出版，并与珍视和喜爱民间音乐的朋友们见面，值此之际，我要写上我衷心的祝愿和自己对这套集成的一点浅见，作为一个家乡人对这位为家乡事业做出贡献的同仁，献上我的一份由衷的敬意。

此套《陕南传统音乐文化集成》共分九卷，涉及各类民间音乐，其内容之丰富、曲谱作品之详尽细密，可谓陕南民间音乐之大观。通揽全书，可以看出编著者新颖之立意和严谨之结构。在如此宏大而充实的内容背后，体现出编著者对于陕南地区——特别是镇安县民族民间音乐的熟悉程度，亦可见出他们深入而扎实的调研功底。

在这九卷中，编著者按照民间音乐的不同类别分为“民歌”（上下卷）、“鼓盆歌”（上下卷）、“花鼓戏”（上下卷）、“唱本”（上下卷）及“三弦弹唱、渔鼓说唱、唢呐曲牌”（合一卷）。在体裁上，囊括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中的“民歌”“曲艺”“戏曲”“器乐”等几乎全部类型。在此基础上，以音乐的性质划分，它又涵盖了口头歌谣、史诗、民间文学、仪式音乐以及各类民俗中的音乐要素。所涉陕南音乐文化，如此规模巨大的收集整理工作，几无遗漏地涵盖整个音乐领域的方方面面，谓之陕南民歌之“集大成者”，真是实至名归。

在我阅读该集的过程中，除了上述种类丰赡的音乐信息的记录保存之外，这套集成还相当深入地对所整理之民间音乐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性研究，例如，在每一卷曲谱调查与记录的基础上，编著者还极为用心地为每一类型的音乐做出详尽的介绍，并兼及精到的归纳和总结，这些极有见底的研究性文字，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镇安民歌概说”“镇安鼓盆歌概说”“镇安唱本概说”等。从中足可见出编著者对镇安民间音乐长期而深入的研究心得，不然，难以有这样透彻清晰的把握和评述。在对具体的民间音乐记录的同时，作者还对民间音乐品种进行了分类编排，例如，将鼓盆歌编为“哭腔歌”“戏腔歌”“杂腔歌”“硬腔歌”四个基本类目，还结合音乐形态特征、运用场合以及音乐的社会功能与性质，把哭腔歌细划分出“一般哭腔歌”“二十四孝歌”等。

众所周知，民间音乐所依托的纷繁复杂又鲜活的方言，是调查、记录与研究民间音乐极为关键的一个环节，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方言是地域音乐的灵魂。这套丛书在相关的分类研究中，让我

深有感触的，也正是编著者透过镇安民间音乐所生长的外在形态特征，而直抵陕南民间音乐所赖以生长的语言环境，并作出恰切而独到的分析，这些，没有对陕南区域方言的谙熟是不可能的。在很多民歌的记录中，作者都对唱词中的语言语音问题予以特别的关注，并在细致考量之后做出尽可能详尽明了的记录与阐述。

这套陕南民间音乐集成能够顺利问世，除了编著者自身所付出的巨大辛劳与努力外，也仰赖于各界对于民间音乐文化的热切关心和实际作为。我了解到，为了这套集成的编撰出版，陕西省委宣传部和中共镇安县委、县人民政府也给予了极大的肯定与鼓励，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党和政府长期以来对民间文化艺术给予的支持与关怀。

翻阅这套集成，对我而言，更有着一份特殊的亲切与不同寻常的意义。和集成的编著者一样，我也是从陕南镇安走出来的一名音乐工作者。虽然这几十年来，由于工作生活等诸多客观原因，自己并未能长时间驻守于镇安家乡，但时至今日，我仍无法忘记“吃着回龙镇的粮、喝着乾佑河的水、爬着大寨坡的山、望着魁星楼的塔”的那段刻骨铭心的时光。可以说，在我的成长道路上，镇安父老乡亲的呵护和淳朴的民风，融进了我的血液中，给我的精神世界打上了一道纯净的底色。同时，自己在几十年来的音乐创作、教学及研究工作中，镇安那些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总能潜移默化地影响我——给我滋养，给我力量。

就像这套集成的编著者一样，我也是在近四十多年前，就开始了对镇安、乃至陕南民间音乐的调查、收集和记录工作，身边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当年采录过的民歌。因之，对于儒成同志几十年来扎根镇安、坚持不懈地深入调查与记录镇安民间音乐这一善举，我有着更为深切的体察。我很高兴看到这套集成顺利问世，仿佛我本人的夙愿得到完成一样。同时，我还希望这套集成能够为关心陕南民间音乐、关心西北乃至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者创作者，提供积极有益的帮助和启示，更期待看到今后更多的民间音乐艺术研究的著作问世，为我们民间传统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贡献出应有的积极力量。

是为序。

（作者：西安音乐学院原副院长、国家二级教授）

2017年4月20日

序 三

自 序

薛儒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讲一方语言，一方语言孕育出一方传统音乐文化来。陕南民间传统音乐文化集成的编著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的。我与民间音乐之缘当远溯半个世纪前。

1966年孟夏，我从东坪小学毕业。当时的小学毕业生，都是社会抢手货。我有很多同学，只要个头够，小学毕业便当上了乡镇供销社的售货员，甚至公社干部等。我是步入社会工作，还是继续读书呢？正在五心不定时，班主任、语文老师段开俭在县文教卫生局获知，西安艺术学校（西安音乐学院前身以下简称西安艺校）面向全省招收附中学生。东坪小学根据我的学习成绩及个人爱好，推荐我参加西安艺校附中招生考试。当时家里很困难，没有路费，父亲将家里的红苕卖了四百斤。青黄不接之际，有多少人饿饭指靠国家给救济粮度日。大家疑惑我家怎能有恁多红苕出卖？那都是度命的口粮啊。父亲一再声明，因儿子要去西安考学才卖的。

筹到盘缠后，班主任与家长商定，考试时由另一学生家长刘治印表叔陪护；念书时，由我父亲送校。临行时，我身着母亲千针万线缝制的一身黑色布条纽扣衫子和抄腰裤子，足登蓝色网球鞋（第一次穿买的鞋），头上是段老师亲手理的少年刘文学发型，脖项系着红领巾，肩上挎一一尺深红平布手工缝制的活口挎包，装着封好的推荐信函和毕业成绩单的文件袋。晓行夜宿，翻山越岭穿越柞水县，第三天晚，歇在了宁陕县广货街，第四天乘安康到西安班车（第一次坐汽车）赶到西安艺校。住在教室里，临时用芦席棉被铺就的地面大通铺。约略一星期后，初试、复试考毕，又翻秦岭，四天后返回家乡。记得在西安市我啥都没有买，只在小寨商场9分钱买了一本《怎样识简谱》的读本。为什么不乘车呢？当时镇安至西安不通公路，需走商县，且商镇班次也不正常，要更多的盘费。返回家里后，第一件事，就是听班主任段老师讲，我们已被录取，再不必参加当地初中考试了。可是，因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去西安艺校上附中的事阴差阳错未能成行。现在想起来，这也应该算是我与民间音乐的第一次结缘吧。

第二次结缘于1970年夏，东坪中学来了县剧团两位招生人员：一位刘文华老师，县剧团作曲、编剧；另一名杨生坤，剧团演员。东坪中学老师通知我去见面，攀谈后得知，二位老师是专门来招收我们的。因为东坪中学有两名西安艺校附中的录取生，当时全县教科文卫体系统都知晓。刘老师说，现在剧团不唱二黄，改唱革命样板戏京剧了。唱腔很高亢，是E调。我接道，E调，就是说，以3（咪）上启1（哆）定调高吧？！刘老师惊讶地说道，薛儒成，你的音乐理论水平比剧团现在乐队的上手（京胡演奏员）刘德林都高。接着问我，愿不愿意去县剧团工作？我愿倒是愿意去，可心里还是想去西安艺校附中上学。刘老师又说，到县剧团工作与去西安艺校上附中不矛盾。只要通知来了，剧团会放你成行的，我当着你的中学各位老师给你作保证。经过上县考试后，我于当年8月报到县剧团乐队，工作至1985年末。1972年，西安艺校恢复招生，我问了来镇安招生的“西北耳王”和教三弦的二位王老师，他们不无遗憾地告诉我，1966年招生作废了。他们这次来是全新地招生。当然，我也可以参加考试。可我已于1970年下半年，被县剧团选送陕西省京剧团，师从田德利先生，学习了月琴弹奏三个

月，是京剧伴奏的三大件之一，眼看着走不开了。

1972年冬，县剧团参加了商洛地区七县八单位“文革”后第一次文艺会演。镇安的节目是新创大型现代花鼓戏《水轮飞转》。演出后，剧本不怎么样，主要问题是未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题，需进一步加工修改，但音乐获得了大会的一致好评。结束后，县上决定增强县剧团音乐创作人员，便从本县教师队伍里调来了1963年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毕业的冯宁老师。其人事关系留县文化馆，工作任务在县剧团。当时我请县剧团乐队小号和二胡演奏员梁永宁（西安市人，西安音乐学院走读生）作引荐，将我推荐给冯老师学习音乐。冯老师分文不取，教了我近两年的《视唱练耳》等音乐学课程。当时，约定每天下午饭后，到文化馆老师家上课两小时，领回作业，完成后第二天如常。

1974年夏，听说冯老师要调到商洛工作。我的心情非常低落，惆怅地去找冯老师诉说。老师放下手头收拾行李的活路，殷切地对我说道，以后要注意岗位适职成材，深入研究板腔体的汉剧（当地称谓二黄）、京剧音乐和曲牌联缀体的花鼓戏音乐；二要注意研究整理当地民歌民间音乐，从中汲取营养；三若再作出歌曲可寄给他修改……并宽慰安抚我说，我所学到的知识，足够一生享用的了。听了老师的话，我顿觉心情舒然，抹泪转喜。老师还是要教我的，我还是可以继续学习音乐的……。四十余年来，每每独自想起，不由默然眼角湿润。今年，我将我写的七篇概说发过去，冯老师不辞辛劳，全部看了一遍。冯老师还是在教我的，我非常高兴。这应该是第二次与民间音乐结缘吧。

1986年元月，我从县剧团调到县文化馆做群众文化工作，其工作对象主要是乡镇文化站业务指导。1988年4月，调到县文物管理所工作至2013年3月退休。在此期间，笔者参加了第二、第三两次多县全国文物普查，参加了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商州东龙山工地考古发掘，西康铁路镇柞段随工清理工作，参加了单位馆藏文物的建档建卡，本县田野8处第四、第五批省级文保单位申报等工作。48岁生日后，本来想在本行工作中做出一些事来。如镇安县境有200余处山寨，最后一次大规模构筑应是在清嘉庆初年剿灭白莲教时应朝廷之命而实施的。研究现存山寨，对发展乡村旅游具有现实和历史意义，也是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但其他啥问题都不说，就个人资格问题却不具备。因为国家要求考古领队资格须是高级职称，而我所在单位编制只有6人，只设一名中职。即使个人搞出成果，不管社会承认否，首先行内是通不过的，其报告是非法的。

如此，干点儿什么事？想来想去，也只能是采录民歌了。1983年季春，我和肖建军一同去东坪茨沟录了几十盒带，当时只注意了曲，未顾记词，大都无用。那时虽有想法，工作作得不多。真正全面实施采录工作是在2005年。

此后，我把搞文物保护工作获得的刨根问底的工作经验，运用到采录民歌的实践中去，才取得了九卷本的成果。

第三次与民间音乐深入结缘是结缘于2005年季春。中共镇安县委、镇安县人民政府决定计划开发木王国家森林公园旅游项目，由时任中共镇安县委宣传部长章登畅负责牵头，组织县上各有关人员前去实地考察调研，我有幸名列其中。4月27日上午，所行人员，统一乘车。我被分配到县林业局一辆皮卡车上。司机张军是位文艺爱好者，会拉大提琴，吹奏萨克斯，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县上编撰《镇安民歌》时，他硬是用老键盘铅字打字机，活生生地敲出了简谱谱面来。熟人见面分外亲热，一路闲拉着过往佳话趣事，似闲云野鹤，过云盖寺镇、翻风凸岭，越旬河大桥，穿游风峡，荡荡乎逶迤行去。

按照总体安排，第一晚宿营在甘岔河村（原为乡政府所在地，后并入杨泗乡）。当皮卡车到场后，只见“木王国家森林公园开发感悟之旅”红地金字大旗，迎风飘扬。听哨声尖响，全体列队集合。部

长站在旗下，宣布了食宿和有关注意事项后，吩咐道，摄影组的去照相，文学组的去作诗文，绘画组的去写生，旅游礼品组的入户摸底……三列横队渐渐散开，奔向各自的坐驾，取出所用物什。各组均无我名，令我十分尴尬。难道我是因朋友照顾，来吃白饭的吗？不，我会记录民歌呀。于是我径直走到附近的小卖部里，买了几本小学生作业本和铅笔、橡皮、小刀之类东西，叫上暂时也没事的节目主持人柯玉勇先生，请到了江武全等民歌手，在小叶常绿古栎树下，席地而坐，记录了二十余首民歌。分析比较，发现镇安西乡的民歌比东乡的民歌更丰富，更有味道。我把此看法和计划今后将系统挖掘整理编著镇安民歌等民间歌唱类文艺藏品的想法叙说给了柯先生。晚上的原生态民歌演唱会上，节目主持人的他在串词中，严肃认真地将我的想法，宣传给了在场的所有人，并号召民歌手们，上县时可到文化大院找我唱歌，我会安排食宿的。我在台下看节目，听到此话后，心里“咯噔”一下。我还未彻底下决心呢，怎么能当众说出如此大话来？

说出去的话犹如泼下地的水，是永远也收不回来的。罢罢罢，我只有痛下决心，将挖掘采录工作进行到底了事。好在改革开放以后，娃她妈借改革开放之春风从农村来到县城办了一间饮食小店，家里的生活人情礼往都是她管，我的工资完全由我支配了。

常言道：事不过三。第三次与民间音乐结缘持续了十三年。在这十三年的业余时间里，我自费利用节假日跑遍了镇安县的各个乡镇及县境相邻地区。拜访了100余名民间歌手，以与时间赛跑的速度和舍我其谁的主人翁态度，挖掘采录整理编写民间歌曲《民歌》（上下册）、风俗歌曲《鼓盆歌》（上下册）、民间戏曲《花鼓戏》（上下册）、民间曲艺《唱本》（上下册）和民间曲艺《三弦弹唱》《渔鼓说唱》、民间音乐《唢呐曲牌》等九册七类民间音乐体裁的文艺藏品。

挖掘录编使我进一步了解到镇安民间方言口语文化。

镇安民歌等歌唱类文化遗存都是以方言的形式散落在民间角角落落。要寻觅到他们，自己得先弄懂地方言语。不通方言是搞不成的。如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记录镇安西乡某些地名时，把“艾蒿”沟写成了“爱好”沟，把“画眉”沟写成了“花美”沟。这明显是方言听辨熟悉方面出了问题。把“卯山酉向”写成了“邓山西向”，这是民间葬俗常识方面的问题。在本集成编著过程中随时便能碰到这样的问题。由于我是本地人，口语略同于关中长安县口音。十三年来，我得处处小心，字字留意。在采录实践中，发现了下河话（略同楚方言）特殊的韵律美。特请镇安籍的军旅书法篆刻名家白帆为我刻篆了一枚“喜呵呵来笑呵呵，客在对门喊山歌。客快请客到屋，给客抽烟吃茶煨酒喝”的闲章，以示对镇安下河方言的学习理解和热爱心情。

整理录编中还发现镇安民间歌戏曲乐中遗存下了一些词的非常冷僻古老用法，如民歌《十所》的“所”字。2014年上半年，县上研究筹备参加省上举办的陕南民歌大赛参赛曲目问题，特别邀请到了商洛市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原市群艺馆研究馆员李忠民先生。因工作之便，我见到了他带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由文化部主持领衔编纂《中国民歌集成·陕西卷》，李先生说，全商洛只有这一套。该卷也收录有镇安民歌《十所》。可是上面写的是“十朔”。按“朔”交待给我们的信息是，正月好唱正月朔，是指一至十月都只能在每月的初一日歌唱或只能唱每月的初一日，这明显是不对的。如果我们用“所”字，便成了正月好唱正月所。即为正月好唱正月这个时候（时段）的意思。以此类推，十个月都是可以歌唱（唱歌）的好时光了。李老师听了以后，建议我就该字写一篇文章。我思量再三，难以成文。即便写成，也无人发表。因为我是草根，蝼蚁草芥耳。所有的期刊报纸都有自己固定的稿源和客户群。用熟人名人的稿子是保险的，也是不会出错的。突然牛槽伸出一张马嘴来，令人生厌。再者，编书人都是教授或高级官员，咱是没资格的。更让我忐忑的是，你能保证你的陕南民间传统音乐文化

集成九卷本没有错误吗？答案是不敢保证的。何况自己最高文凭只是一个陕西省工农教育委员会发给的高中补习毕业证呢。

通过整理编著，我感到中国有两部历史。

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世人皆知。我说中国有两部历史，一是指正史、官史，其特征是写在书面的，如《史记》《汉书》《三国志》《唐书》《宋史》直至《明史》等。另一部历史是广大劳动人民（特指识字不多或文盲）口口相传的历史。这是我挖掘整理陕南民间传统音乐文化集成后发现的，但确实是存在的。至少，文革前是这样的。书面史，读书的人都知道，或都可以去了解。而口头历史讲的更久远。如果说书面史是从新、旧石器时代写起的，而口头历史则是从四十六亿年前地球还未诞生讲起的。而且地球的诞生过程不是物质的，而是哲学的，是“无中生有”的。对天地人的诞生有明确的交待，即“天生子，地生丑，人生寅”。整个衍进过程既包涵着书面所有的先秦神话故事，如盘古开天、夸父追日、女娲补天造人、嫦娥奔月等。还有不少神人行进的过程，如三教创立、日月诞生等。这种情况可以从鼓盆歌《乾坤转》阴、阳本中看到。

我还觉得中国有两种汉语语言。

当然，这主要是指汉民族的书面语和口头语，书面语比较统一，不管是古代用语还是现代、当代用语。而口头用语则太复杂了，这因为方言是不统一的，是以文化圈或更小的范围为单位形成的。

镇安民间方言也有一套专有的词汇支持，且特别丰富。书面语把用韵文写成的文章都称作诗、词、诗歌、歌谣等，而镇安民间的称谓是“四言八句”。仔细分析，四言八句是多么的贴切具体啊。三百篇是诗之鼻祖，而它们正是以四言为主成文的。律诗是八句成篇的。

书面语的君子与小人，对应到口头方言中约略等于光棍和廋子。鼓盆歌有“宁给光棍拉马，不予廋子当军师”说，这里光棍、廋子不就是君子、小人吗？

镇安口语中将凸凸凹凹读“bao bao wa wa”。是很形象的，而字典上则读音“tu tu ao ao”。虽然，近几年，凹字因名人的名字解决了读音问题，但“凸”音无法使人认可，只能改“包”字。读起来好像总没有凸字明白清晰。如民歌词：“……包包凹凹路不平。那包包儿好似主东的摇钱树，那凹凹儿是主东的聚宝盆。”

十三年采录编著工作，是一艘逆水之舟，不进则退；是一溜阶梯，每登一步，必有新的景致呈现在目前；是一壶美酒，越饮越浓冽甘醇；是一杯香茗，愈品愈有滋味；是一盘棋局，博弈之中，其乐无穷。十三年艰辛和情趣自在其中。

先说四下小河子。

第一次到小河子是1985年秋，访录山歌《乌云姐儿》。当时思想狭隘，认识以曲调为主，所以只录得一段词。第二次是2009年盛夏，叫了一辆出租车，到小河子一问，歌手汤长兴已故，其弟长青也是歌把式，但外出走亲戚不在家。当时很失望，车已放回，只得在烈日下步行十余里到米粮镇，租一辆摩托转到另一条路寻访民歌手沈氏叔侄，又不遇。人家已在山阳县界唱鼓盆歌去了。旋即乘最后一班车，摸黑返回县城。我想，今天寻人不遇，一定与出行日子有关。几月后，见到了我姑婆的儿子李集员表叔。叙说后，他教给了我选日速成，虽然原理我不懂，但从此以后不管到哪里，都能会上人了，省却了不少烦恼事。第三次去时，见到了长青先生，听说来意后，他很高兴，便去找来了本村山歌手李源茂，说明后我便打开卡式录音机请二位歌唱，录完后放出来听不清楚。多次调试，还是不行。原来机器太老了，只能放，录的功能已失去了，我只得手记。回来后，第二天中午趁热把记录的山歌又整理一遍。用的是蓝黑墨水，钢笔书写完后有点潮湿，用糨糊贴了顶端，搭在椅背上晾着。这时来了

一股狂风，将五楼后阳台外栅架上摆放的大花盆掀落，砸在后阳台天窗上，砸折了6号钢筋防护网，砸穿了一厘米厚的玻璃天窗。大雨倾盆注入后阳台。我住一楼，后阳台外有不到一米的空间，天窗是我外扩建成的采光处。我急得去找拖把盆子。片刻，雨停日出，待我收拾完雨渍后，我的山歌和底稿连一个字都辨认不清楚了。无奈，只得重买卡式录音机，第四次下小河子，又找到两位老歌手，是他们讲清了山歌、草歌、调子的关系，又录回了山歌。但采录时总觉得不如雨前唱的山歌好听，当时一再启发重唱，多遍后仍找不到雨前韵味，无法弥补了。也罢，山歌本来就是即兴的，一回和一回的曲调组成是不一样的。

再说电脑中毒。

采录工作进入到五六个年头后，我问出过书的人，出版社要什么样的稿子，告诉我最好是电子版，万一没办法了，抄写整齐的稿子也行。我一想我的字写得不好看，且错别字多，还是要搞电子版。满大街打字店无人会打曲谱。我便请一名县剧团的新生给我打。说妥后，我送其在县上电脑学习班学了打字，又购卖了专用软件，后来他给我打了一两首，因单位忙而不能进行下去。女儿下岗在家带孩子，孩子开始上幼儿园了，女儿便为我打字。她是学幼师的，学过音乐基础知识。为了赶进度，女儿打带曲谱的，另顾了一名打文字的。第二年便打出了当时百分之八十的稿子。我改过一遍，觉得很有眉目了。7月，内侄高考，一天晚上九点多，拿了一个U盘，说是有一篇英语材料要在电脑上看一下，我当时很想给十元钱让他到网吧去看。但后来又想，这样做有些太不近人情了，就没有发话。第二天，女儿来看电脑所有文件全部染毒，无法辨认。只得让其杀毒。中国杀毒软件杀不死，便下载了进口软件。杀毒后，除带曲谱的还在外，其余一千多A4码的文字稿全部杀光。再过几天，电脑全部坏死无法启动了。没办法，只得重新买一套电脑和新的音乐软件，重打鼓，另升堂。好在是存有一份底稿。便买了扫描仪重新扫描，扫描出来的东西总有一些字是识别错误的。如“间”字弄成了“问”字，“天”字弄成“大”字等，徒添了许多的麻烦，令人心情极不愉快。不知多做了多少无用功。

本当只想把镇安民歌搜集整理一下，但将所有采录到的材料在案头分类处理以后，便获得了七大类，编成了九册书。大有种豆得瓜之喜悦与乐趣。为什么用了十三年才做完呢？原因很多，最主要的一是业余时间，其中十一年里主要在搞好本职工作前提下，利用节假日和平时加班完成自己的收集整理工作。二是没有专项资金支持。如果下乡钱不够，便停止下乡找人，等到下月工资来了再去。三是尽量跑遍所有乡镇，不留死角。

在处理案头稿件时，每当犯困、犯怵时，便想起幼年在家同父亲在田间做活时父亲的教导：“人怕做活，活怕人做。”是的，活怕人做啊。我便重新拿起笔，一句一句一小节一小节地听记处理下去。没有人商量，非常孤独。唯一的协同者是女儿薛森，但她是做具体工作的。有的朋友说我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情，现在想起来，我只是孤独地做了一件闷活路而已。

十三年来，多少次寻人不遇，多少次遇人不唱，多少次让出租车司机借故扔在半山上……种种艰难曲折，般般心酸委屈，不足与外人道也。

2015年底，镇安县委、政府公布了“十三五”发展规划，将县域经济的未来五年或更长的发展重点之一一定格为“发展文旅高度融合的乡村旅游”上。而镇安的民间传统音乐就是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她有数千年的地方文化根基，广泛地植根于当地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之中，特点明显。在漫长的农耕文明中，发展到了极致。镇安乃至陕南，位处在秦、楚文化的重叠区。秦、楚文化在两千多年前，就是很强势的。春秋五霸，秦穆、楚庄占其二。秦楚在陕南碰撞结合，特别是经过时间老人的调教后，其歌韵风格既不是秦文化的“高快硬响”，也不似吴越文化的“吴侬软语”，应是秦文化与楚文化结合

特色混合的江汉文化。而镇安正处位在江汉文化的西延块区内。民间歌唱音乐是依附于语言而成型的，而民歌是以当地方言音韵声调行腔的。在陕南、汉江及其支流广袤山水间，由于部分秦方言音韵声调的楚化和楚方言部分音韵声调的秦化，便产生了极富地方特色的歌唱音乐文化来。而这种极富地域特色的歌唱音乐文化正是文旅结合的重点之所在。正因为如此，中共镇安县委、镇安县人民政府将出版《陕南民间传统音乐文化集成》列为镇安十三五文旅深度融合的系统工程，拨给专款公开印刷出版发行。

感谢原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现陕西省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陈彦乡党，为镇安民歌研究会的成立发来贺电，并同意使用其在陕西日报2016年5月24日6版发表的《推荐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文章。

感谢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长，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学院博导、上海音乐学院博导、西安音乐学院特聘教授乔建中先生，于2016年4月28日光临镇安参加镇安县民歌研究会成立暨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送给“天籁绕青山，民歌铸心间”书法作品祝贺，并从学术高度为本书作序。

感谢原西安音乐学院教授、副院长、纪委书记王平乡党于2016年4月28日光临老家参加镇安县民歌研究会成立暨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并送给“人间性情之响，自然天地之音”书法作品礼贺，并热情洋溢地为本书作序。

感谢省文化厅非遗处处长崔天民，感谢县政协主席陈正斌及刘根子、杨小红、舒志云等女士、先生的支持与襄助。

感谢杜云山、吴相阳录制了《寻歌》等两期专题片鼓之呼之。

感谢朋友刘立勤撰写了长篇人物通讯《薛儒成的花鼓情结》，给予我的鼓励。

感谢原镇安县中学特级语文教师王鹤正先生应邀担任本集成文字校对并撰专文点赞。

感谢西安西京学院副教授、教务处长肖建军先生来电祝贺镇安县民歌研究会成立并应邀担任本集成音乐编辑。

我的家人也给予我全力支持。老伴支持编著全过程，女儿十余年参与打印、校对、填词等集成编纂具体工作，女婿梁志武多次出车载我往来、襄我事成，儿子薛力文、儿媳王能贞勤劳持家，为我采录整理送一路顺风。在这里也一并表示谢意。

感谢所有为我唱过歌的民间歌手们，已故者，愿他们驾鹤西去，位列仙班；健在者，祝他们长寿康泰，家庭幸福。

由于本人的文学、音乐、戏曲、曲艺、历史、民俗、文字、方言、宗教诸方面水平有限，拙编错误与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不吝赐教。

2017年4月

特载一

推荐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

陈彦

[编者按] 5月23日，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4周年纪念日。遵循《讲话》精神，让精彩的作品植根生活沃土，反映百姓生活和跃动民族精神，记录时代脉搏，弘扬传统、薪火相承是每个文艺工作者的传承与担当。文化的成长，如同宝塔，巨大的塔基就是千千万万个一线文化工作者。今天，本报编发著名作家陈彦的《推荐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为您讲述20多年间，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用生命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诠释。

他叫薛儒成，是镇安县文物管理所的一个退休干部，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也了不起得足以让许多文化人，面对他时，不能不心生敬重。他所做的事情，对于一个处在基层的文化人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建树。

纯粹为音乐节奏而活着

薛儒成是一个来自乡村的民间音乐爱好者，开始在县剧团弹奏中阮，性格好动，每每弹奏时，四肢戮力，生命亢奋，屁股随着节奏上下颠动，酷似民间造屋打墙，一杵杵下去，松散泥土渐成墙坯，而薛儒成的座凳，却屡屡被肉屁股杵成卯榫脱落、四腿残缺、甚或散成八瓣的“瓦渣滩”。即使置身一群乐人之间，你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另类，“另”得近乎“抽象”“怪诞”，咋看，你都觉得，这是一个纯粹为某种节奏而活着的人。这个节奏就是音乐的节奏，即使吃饭，端着碗排队，他也是要制造出一种音乐响动的。有些人对某种事物的痴迷、醉心，你总觉得浮泛、浅表，没有走心，而薛儒成对音乐的憨痴，似是一种“娘胎”里带来的“歹症候”，一不小心，甚至活活“病痛”了一生。这是后话。

我跟老薛有过好多年的交集，早先也并没看出，若干年后的老薛，会干出这等抡锤打铁般的扎实事来。平常就觉得他有趣，什么没意思的事情，让他做出来、说出来，就有了意思。记得那时机关干部职工每天要参加义务劳动，从河里背石头，上县城背后的花果山砌台台田，那个累呀，少有不哀叹抱怨的，可老薛总是要选些奇形怪状的石头，或背，或抱，或挎，或举，或提溜着，不仅姿势古怪，且有肉嘴音乐伴奏，到了紧要处，还会放声唱一段“姐在房中绣呀绣兜兜，郎在外面打呀打石头，姐叫郎君莫要打呀，把贼劲留到吹灯后”的喊山调，他硬是把一种枯燥劳动，转换成艺术，不仅娱乐了自己，也让跟在他前后背石头的人，都有了一份劳作的轻快感。在我印象中，老薛身边总是猴猴着一窝人，不仅有男的，也有女的，连那些年轻姑娘娃，也总是羞答答地不远不近地跟着，装作没听见，或者没听懂，有时又忍禁不住，刺啦一声，笑得连石头都跌进了沟里。因此，领导也多有对老薛不满的，老薛就警告大家不要跟他，说小心跟着“犯错误”。但他自己，想严肃又严肃不起来，有时越严肃还越出喜剧效果，大伙就不惜冒着“挨批评”的危险，继续把他紧跟着。你永远不知道他啥时就能制造出一点喜剧效果来，反正猛不丁，半山腰中他行进的地方，就炸锅一般响起了笑声、欢呼声，羨